

音调不定的号角

馬克斯威尔·D·泰勒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音調不定的号角

馬克斯威爾·D·泰勒著

北京編譯社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3年·北京

Maxwell D. Tayler
THE UNCERTAIN TRUMPET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60

根据紐約哈發兄弟出版公司 1960 年英文版譯出

• 內部讀物 •

音調不定的号角

〔美〕馬克斯威爾·D·泰勒著

北京編譯社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60 元

1963 年 3 月第一版 1963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4\frac{3}{4}$ · 字數 106,000

統一書號 3003 · 671

出版者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帝国主义凭借其所谓“原子优势”，推行“大规模报复”的侵略政策，妄图称霸世界；可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总形势下，美国帝国主义这个“核威慑战略”，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世界革命人民面前，遭到彻底破产。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美国朝野人士曾于1958年对其侵略政策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沉痛的”检查和争论。本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它主张放棄“大规模报复”政策，代之以所谓“灵活反应”战略。

本书作者馬克斯威尔·D·泰勒是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2年10月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美军第一零一空运师师长，1945年出任“西点”军校校长，1949年担任美国驻欧洲部队参谋长和驻柏林美军司令；1953年任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1955年出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同年6月调任美国陆军部参谋长；1959年因在战略思想与侵略步骤上与当局意见不合而辞退，并着手撰写本书。1961年4月肯尼迪政府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后，曾奉命专门负责“就非常规的军事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1961年7月被任命为总统的特别军事顾问。1961年10月和1962年9月曾先后两度亲赴南越，策划和部署屠杀南越人民的“斯特利—泰勒计划”，加紧进行“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

本书是于1959年出版的。当时深得肯尼迪的赏识，他在1960年许多次总统竞选演说中曾引用了书中的若干论点，作为攻击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治彈药。肯尼迪上台后一再叫嚣要在准备打核战争的同时，建立一支“更强大和更灵活的非核力量”等做法，同本书的某些論点完全脗合。本书內容对了解美国統治集团前一阶段在战略問題上发生的內部矛盾和爭吵，以及現政府所推行的侵略与扩张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1963年2月

若吹出无定的号声，誰能預备打仗呢？

——《新約全書·哥林多前書》，
第十四章，第八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大錯特錯的見解	5
第二章 “大規模报复”理論的产生	13
第三章 1953—1956 年,“新面貌”在实施中	22
第四章 1956—1959 年,“新面貌”衰老了	40
第五章 从理論上看我国軍事战略的制訂	64
第六章 參謀长联席會議如何进行工作	70
第七章 决策程序失灵——从事实上看軍事 战略的制訂	89
第八章 “灵活反应”——新的国家軍事計劃	99
第九章 音調明确的新号角	123
附 录	134

前 言

在1944年6月6日开始进攻諾曼底半島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們这些負責指揮美国空运部队进击的人們，对于諾曼底半島上我們的伞兵和滑翔部队准备着陆的某些地区中德国人所进行的新的活动非常关心。对这个地区所进行的空中照相表明，那里每天都出現新的防御工事，显然是为了阻擋空运部队的进攻。照片解說員告訴我們說，那些防御工事主要是一些直徑八吋、高八呎的竿子，按照跳棋棋盘的式样密密麻麻地埋在諾曼底的許多田野里。我們立即想到，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这些竿子的埋法，就能够断定德国人的防御計劃。我們至少可以弄清他們指望我們如何着陆。

在英国伯克郡新伯里我的师部里，我們一夜又一夜地埋头研究新拍得的照片。但是尽管我們作了种种努力，我們却一直无法弄清德国人的这样作法究竟是何用意。竿子到处出現，但在選擇地点上，或者这一地区在完成此項工作上先于任何其他地区，沒有任何证据，說明这是有計劃的。这样，我們就在对德国人的意图和部署仍然是迷惑不解的情况下，于6月5日的黄昏起飞了。

当我率領着我的一队队伞兵在“进攻开始日”清晨的朦朧中着陆以后，我立即集合了一小部分士兵，包围了我們所遇到的第一个农舍。在了解到附近德軍的情况以后，我就向那个农民打听他地里埋竿子的事情。

“我看見你家西边的那一小块地里有許多竿子，可是东边的

那一大块地里却一根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哦，”那个农民说，“德国人告诉我们，要在6月15日以前把所有的地里都埋上竿子。可是我的那头母牛最不喜欢西边那块地，所以我就先在那里埋了竿子。”

事实就是这样，至少单就这个事例来说，德国人的防御计划，除了那头法国母牛的偏爱以外，并没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我怀疑，在整个诺曼底乡间，大概都是这样缺乏计划的。尽管这个故事有其可笑的一面，但它却提醒人们，当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为军事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左右时，就会造成什么结果。根据法国母牛的偏爱而埋的那些竿子，对于我们的着陆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我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我深信，美国的防务目前大部份被非军事因素或已经过时的军事因素所支配着。尽管有人极力主张，我应该在离开参谋长的职位之后，先冷静一个时期再动手将我自己的看法写下来，我却深深地感到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局势日趋紧张，而军事实力却日益下降。为了及早地制止这种趋势，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某些行动——那就是本书中所说的“快速修补”。要想找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补救办法，就必须要求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战略进行一次全盘的重新估价。如果本书能提供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从而使这次利害攸关的重新估价工作，得以着手进行，也就算达到它的目的了。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发现有必要多用一些篇幅谈一谈国防预算。这似乎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题目，但是，只要国防预算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它就远不仅是只有那些财政专家们才感兴趣的一堆枯燥的数字。国防预算应该是体现在美元上的我国未来安全所系的军事战略。因为国防预算所提供的款项将影响

未来三、四年內的軍事計劃，所以这个預算实际上就把我們的領袖在这段期間作出抉擇和采取行动的自出抵押出去了。因此，如果我們要想改变我們在防禦事務上的作法，現在就應該动手，不要让另一个年度預算使过去的錯誤一誤再誤，貽害将来。如果我們的号角要吹出一种改变了的音調，現在正是調整音調的时候。

我在五角大楼时的那些老同事們，将不会从这本书里发现什么新东西。书中这些看法和批評，在我担任參謀長^①的四年期間，我大半都已在国防部範圍內談过許多次。一般說來，为了避免引证不确，我不打算将我的同僚中那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高明爱国人士的反对論点詳細地記錄下来。不言而喻，在采取我这里所建議的任何行动之前，他們的那些观点都应予以极端认真的考虑。一个能够滿足我国战略需要的最終方案，應該是三軍中最有才智的人士的通力合作的結果。

书中有些地方，可能会使讀者感到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应有更多的說明。但是我在写作时，为了保密和有分寸起見，不得不謹慎从事。考虑的結果，某些地方只好从略，但是我并不认为，从略的地方对于本书的主题是关系重大的。

本书的文責由我自負，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曾得到許多才智之士的直接或間接的帮助。我曾有幸与那位能体諒人又有胆略的陸軍部長韦尔伯·M·布魯克一度共事。他肯于为自己所信奉的任何事业承担責任并願为之坚决奋斗，这就在我們全体軍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文官領袖的榜样。在本书中所討論的許多重大問題上，陸軍參謀部的許多官員对我的观点都有影响。当我在參謀長联席會議和其他場合為我的主張进行辯护

① 指陸軍參謀長，本书作者于1955—1959年任美国陸軍參謀長。——譯者

时，他們曾不斷对我的論据提出尖銳的和一針見血的批評。在我所允許的範圍之內，他們都尽到了出色的參謀人員的本分，他們确曾尽力使我这个“老头子”既不致于犯太大的錯誤，也不致于犯太多的錯誤。同这些干练人員的令人获益的共事，是我担任參謀长职务所得到的最大報酬。

因此，要想向許多对我写这本书提供了种种帮助的人士一一致謝，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不能不提及我的副官长伯納德·W·罗杰斯中校，約翰·J·普罗克特准尉和約翰尼·L·斯科特技术专家——他們都是我的直接下屬。我的家庭成員，特别是我的妻子丽迪亚，我的儿子約翰·泰勒和儿媳普里西拉·泰勒，在提出他們的非軍人的观点并为之辯护时，也給了我极大的帮助。哈潑出版公司的伊凡·托馬斯先生为我作了一件特別困难的工作，那就是减少甚至消灭本书中的專門術語和五角大楼的老套；这些东西，一个在五角大楼长期工作的人必然会在笔下流露出来的。

最近曾有人問我，在我过去的經歷中，哪一段经历对我担任參謀长的职务最有裨益。是在陸軍參謀学校和陸軍軍事学院当學員的那一段？还是珍珠港事件前后追随馬歇尔將軍服役时的那一段？或者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欧洲担任第一零一空运师师长或在朝鮮担任第八軍軍长的那一段？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說，“对我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我进入西点軍校以前在堪薩斯城东北中学辯論会作會員的那段經歷。”本书将会向讀者表明道理究竟何在。

馬克斯威尔·D·泰勒

第一章

大錯特錯的見解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第一零一空运师师长时所記的战时日記中，有下面这样一段：“1945年7月28日（星期六）。驅車前往貝茲迦登与馬歇尔將軍和巴頓將軍共进午餐。参观第二軍的徑赛运动会，并与馬歇尔將軍同返貝茲迦登山庄。第一次听到原子彈的消息。”

这段日記的背景是这样的。欧洲胜利日那天，第一零一空运师正在越过巴伐利亚南部向貝茲迦登急进。这个希特勒的著名別墅，連同柏林，是尚未陷落的最后两个納粹象征。尽管这个崎嶇的山岳地带据称是德国人严密設防并准备为之战斗到底的一个全国性要塞，但在美国第三步兵师、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一零一空运师的联合攻击下，实际上很快就陷落了。我所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方的最后一陣射击，就是来自貝茲迦登西边山隘处的一挺德国机关枪。

第一零一空运师剛剛在阿尔卑斯山麓这个風景区駐扎下来，便开始接待了許多显赫的来客。有的客人来的非常仓促——他們是不願被正在东部向前推进的俄国軍隊所俘而逃来的德国將領。德国在意大利的司令官凱塞林元帅、装甲部队的重要將領古德里安將軍和許多次要的人物都投奔了我們的空运部队。其他的客人則来得比較从容——他們是美国的或是我們盟邦的將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945年7月底非常高兴地得到通知，在

战争刚开始时我在陆军参谋部亲密共事过的馬歇尔將軍参加了波茨坦會議以后，正动身前来訪問我們。他通知說，他希望在貝茲迦登安靜地休息一下，但是他願邀請巴頓將軍共进午餐；当时巴頓將軍的第三軍司令部就在貝茲迦登以西約七十哩的巴德—托尔茨。

我把馬歇尔將軍的願望轉告了巴頓將軍，并在約定的時間前往薩尔斯堡临时機場欢迎这位參謀長^①。他到达以后，我便送他前往貝茲迦登山庄，把他安置在过去納粹大头子們經常居住的一套房間里。巴頓將軍在临近正午时刻到达，我們三人便在馬歇尔將軍的房子里安适地共进午餐。我們当时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波茨坦會議的情况。午餐后，我帶領两位貴宾前往当地的运动場，第二軍和我的空运师的運動員們正在那里举行徑賽运动会。我們三个人沐着溫暖的巴伐利亚阳光，同运动会的其他观众稍稍隔了一段距离。在喧嘩的声音暫時停息时，馬歇尔將軍轉过头来，很鎮靜地对巴頓將軍和我說，“先生們，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当你們听到我所要說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沒有必要提醒你們應該保密了。”

于是，馬歇尔將軍便开始告訴我們一件我們以前毫无所悉的事情——十二天以前（即7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爆炸了。他簡略地对我們敘述了“曼哈坦地区”^②在萊斯利·R·小格罗夫斯少將領導下的发展經過和格罗夫斯及其同事所克服的种种重大困难以及最后爆炸成功的情况。他打趣地解釋說，这不是“向外爆炸”（explosion）而是“向內爆炸”（implosion）——我认为这更会加重我們的显而易見的惶

① 馬歇尔当时任美国陆军參謀長。——譯者

② “曼哈坦計劃”是美国制造原子彈計劃的代号，因此，制造原子彈的工厂所在地区就叫作曼哈坦地区。——譯者

惑不解。

馬歇尔將軍在談过爆炸的可怕威力及其在軍事上的若干显著意义之后，說了下面兩句話，結束了这次討論，這兩句話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說，“先生們，在8月的第一个月夜，我們就要把一顆这样的炸彈投到日本人的头上。我认为我們不需要使用兩顆以上。”

巴頓將軍和我默默相对，我們两个人都深深地思索着馬歇尔这番話中所包含的可怕意义。当时，我至少是在揣測这种武器对太平洋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并且从而又很快地联想到这些武器在未来的战争中可能又会具有何种意义。如果我們曾有这种武器為我們扫清欧洲的道路，当时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妨想一想，我們成千上万的英勇将士的生命就可以不必牺牲了。当时我确曾在想，我們已經拥有一种能够維持和平的武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再也不敢用战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由世界了。

至少，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于巴頓將軍怎么想的，我就永远无从得知了，因为那一次就是我們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会晤。但是，如果說我們两个人当时都被一种大錯特錯的見解所迷惑，那是不会有什么錯誤的，这种見解就是：从今以后，使用或威胁使用具有大規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就足以保证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闡明这种概念确实是大錯特錯的，就是本书主要的目的。

历史不久就证明了馬歇尔將軍对于这种新的原子武器对日本能够发生何种影响所作的估計是正确的。兩顆原子彈的确就完成了任务。日本投降了，胜利被贏得了，核时代已經来到。对于美国掌握的这种新武器的惊人威力，整个世界所得到的印象，甚至要比貝茲迦登徑賽运动場上这三位將軍所得的印象更加深刻。我国的人民馬上就认为，我們的武装部队已經拥有从空中

投擲的原子彈這種絕對武器，从而使獨占這種武器的美國，以威脅使用這種武器就能維持世界的秩序。這樣，最後被稱為“大規模報復”的一種新的戰略信念便在1945年產生，以後並在我國政府1953年採取的所謂“新面貌”綱領中，作為正統的軍事學說而完全被接受。在這段過程中，這種新的戰略信念在朝鮮戰爭中受到了挫折，因為朝鮮戰爭否定了它的許多基本假設。但是，它仍然存在，並且甚至在本書所述及的種種變化之後仍然盛行。“大規模報復”儘管曾經幾度暫時失勢，但至今仍是指導我國軍事準備的基本戰略概念。從國防發言人偶而發表的聲明中，有時也可以看到，似乎並不是絕對信賴“大規模報復”，但是我們的年度軍事預算的數字卻表明了這種信賴心有多大。自從朝鮮戰爭結束以來，而且儘管朝鮮戰爭還給了我們許多教訓，然而我們的軍費總是最優先地被用來滿足大規模報復和全面原子戰爭的需要。“你的財寶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①

我認為，作為戰略指導概念的“大規模報復”已經到了末路，目前迫切需要對我們的戰略上的需求進行一次重新估價。“大規模報復”戰略在其全盛時期也只能使我國領袖有兩種選擇：發動全面核戰爭或是妥協和退却。自從這種戰略最初出現以來，已經發生了許多世界性的事件；這些事件證明了它的效力值得懷疑，並且揭露了它的荒謬性。朝鮮戰爭，即美國在其原子壟斷時期所進行的一場有限的常規戰爭，就是大規模報復戰略萬能的明顯反證。1945年以後發生的其他許多場有限戰爭——讓我們只舉幾個例子：中國的內戰、希臘和馬來亞的游擊戰以及越南、台灣、匈牙利、中東、老撾事件——也都清楚地證明，我們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可能已經防止了大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却

^①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一節。——譯者

沒有維持住小和平；也就是說，沒有消除那些只比全面戰爭浩劫較小的動亂，維持住和平。

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要求對我們的軍事战略进行重新估价。我們已經失去了以前的原子壟斷地位，我們很可能在彈道導彈的数量上落后于苏联。我們還沒有反彈道導彈作為抵消这种进攻优势的防禦手段。我們沒有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对抗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我們的很多軍事盟國都患着貧血症。我們正在进行一場毫无胜利希望的比赛，因而必須改变这种局势。但是，这种改变由于我們的战略决策机构和程序上的弱点而变得非常困难。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參謀长联席会议制度已证明缺乏效率，因而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作为對我們的战略进行全面重新估价的先决条件。

我要提出的用以代替“大規模报复”的战略理論，在这里叫作“灵活反应战略”(Strategy of Flexible Response)。这个名称表示，我們需要一种对可能的挑战的各种現象作出反应的能力，必須具有应付从全面原子戰爭直到像 1959 年威胁老撾、柏林的渗透和侵略的能力。这种新的战略将承认，迅速地遏制或打贏一場有限戰爭，和遏制全面戰爭是同样必要的。否則，我們所不能迅速打贏的有限戰爭，也可能使我們遭受零星的消耗，或是使我們卷进一場扩大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可能发展成为我們都想避免的全面戰爭。

要在战略上进行这种改变，就需要有許多作为。这首先要要求国家安全委員會給国防部以明确的指令。这就需要參謀长联席会议日夜工作，依照指令为各种軍事需要排定先后的次序。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国防預算，以保证按照这种先后次序使用款項。所有这些措施总起来就将构成“灵活反应的軍事計劃”，而这种計劃正是为了扭轉 1961—1964 年我們和苏联面面对的情况

下所处的严重不利的軍事地位所急需的。

要想对国家安全的問題进行任何认真的討論，一开始就必须对某些基本名詞的含义取得一致的理解。像“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这两个名詞，早就应该給以明确的定义。在本书前部，我将按照政府中战略制訂人士目前所下的定义来使用这两个名詞。不过必須說明，我并不同意他們所下的定义，我在以后所作的批評中将指明这一点。但是，“全面战争”这个名詞，就目前而言，系指美国和苏联的军队直接牵涉在内，而且从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一場冲突。另一方面，“有限战争”将被认为是一场不够全面战争程度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美国军队将按照实现国家目标的需要而使用原子武器。提出这两个定义的人們认为，这种局部战争可能发生于欧洲以外的不发达地区，而且只需要美国以有限的兵力应付。

这两个定义只是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以后，才在官方人士中間用起来，而且現在仍然有人不断地企图加以修改。反对这个“全面战争”定义的意见是，这个定义看来似乎只要美苏两国的军队发生接触，不管事态的大小及其政治重要性如何，我們的正当反应就是发动全面的原子轰炸。这个定义問題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問題，它能够产生非常实际的影响。例如，坚持这一定义，只能使为应付苏联或其盟国封鎖我們的柏林通路所造成的局势而制定的切实可行的計劃归于无效。在制訂应付这种意外事件的計劃时，这些定义就能被利用作为一种論据，来反对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进行試探，以判明苏联的意图，从而避免我們在一种虛張声势情况下就被排斥出柏林的可能性。由于这种試探行动可能招致美国军队同俄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它就会导致全面战争——如果我們确实认真对待这个全面战争定义的話。从常識可以断定，我們并不会这样认真的；但是，既然这个定义仍